



中华遗嘱库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遗嘱继承服务

让更多的人享受专业公正高效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潘晓磊

中青年遗嘱数量十年增长了24倍；房产归属最受老年人关注；指定亲友为遗产管理人占比为87.2%……

3月21日，中华遗嘱库发布2023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在对超过31万份遗嘱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同时，还对虚拟财产遗嘱等重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中华遗嘱库创办人、项目办主任陈凯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华遗嘱库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遗嘱服务和继承服务中，通过推动继承领域的普法宣传、推动遗嘱继承服务深入基层、推动构建联动机制等举措，协助人民群众更好利用遗嘱这一工具来保护和传承家庭财产，同时化解继承纠纷于源头，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中青年遗嘱数量激增

2023年初，“90后”网红博主小伊主动联系中华遗嘱库，拥有百万粉丝的她决定将自己账户内价值300万元的虚拟财产留给父母继承，而自己百万粉丝的互联网账号则留给好友运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财产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订立遗嘱时，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将虚拟财产纳入其中并进行合理分配。白皮书统计，2017年至2023年，中华遗嘱库共收到488份涉及虚拟财产的遗嘱。其中，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数量最多，分别达到162份、147份、129份，占总数的89%以上。

近些年来，微信账号、QQ、支付宝、网络游戏账号、多样化的虚拟货币等成为立遗嘱人群的重要资产。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龙翼飞表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虚拟财产只要是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都可纳入遗嘱中处理，人们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虚拟财产。

中华遗嘱库在对比历年所统计的遗嘱人平均年龄后发现，订立遗嘱的人群平均年龄持续下降——遗嘱人平均年龄已经从2018年所统计的77.43岁降低至2023年所统计的67.82岁，遗嘱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

与此同时，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中青年人数量也越来越多，遗嘱正在被更多年轻群体所接纳。

2017年在中华遗嘱库进行遗嘱咨询的中青年人数量为931人，而到了2023年，咨询人数达17101人，咨询量上涨了17.3倍。同样，2017年在中华遗嘱库进行遗嘱保管的中青年人数量为279人，在2023年这一数量达到了7124人，7年上涨了24.5倍。

房产归属最受老年人关注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幸福晚年”。

对老年群体而言，高质量的遗嘱服务是他们安享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3年，在中华遗嘱库进行咨询的中老年群体数量为21420人，登记保管量为6804人，保管比例为31.76%。到了2023年，在中华遗嘱库进行咨询的中老年群体达85622人，登记保管量达53422人，保管比例上升到62.39%。由此可见，中老年群体对订立遗嘱的相关需求越发旺盛。

“对中老年群体而言，高质量的遗嘱服务关系到老年人财产权益保障以及晚年家庭幸福和谐，有助于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和谐社会目标。随着人们订立遗嘱需求的日益旺盛，应尽快将高质量的遗嘱服务纳入老年服务体系中。”龙翼飞说。

白皮书数据显示，6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主要财产类型包括不动产、银行存款、公司股权、证券投资基金、理财合同以及名贵收藏品等。其中不动产为主要财产类型，2023年占比高达99.78%，其次是银行存款，占比15.82%。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建伟指出，老年人的主要家庭财产仍然以房产为主，房产不仅仅是家庭的一项主要财产，而且是老年人晚年得以安居生活的保障，通过遗嘱保护房产，对于老年人的权益保护、晚年幸福和家庭平稳发展都至关重要。

超八成指定亲友为遗产管理人

自民法典推出遗产管理人制度后，遗产管理人就备受关注。

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日报》副总编辑李学梅表示，推动遗产管理人职业化进程，不仅有助于遗产服务朝着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更有助于带动“银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并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为此，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尽快将“遗产管理人”作为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大典，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白皮书显示，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的遗嘱中，指定亲友为遗产管理人的占比为87.2%，而指定他人或机构为遗产管理人的占比12.8%。这充分说明，人们订立遗嘱并指定遗产管理人时，更倾向于人际信任。

陈凯认为，亲友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优势在于，他们熟悉逝者的意愿和生活习惯，有助于确保遗产按照逝者意愿分配，同时，亲友之间沟通更为顺畅，可以减少遗产处理过程中的矛盾纠纷。但也要看到，当亲友不是遗产管理专业人士时，其可能无法很好地处理财产过

户、继承手续、法律文书、诉讼程序等问题。面对遗产分配不均与他人质疑时，容易引发更大矛盾。

“相较于亲友，专业的遗产管理人具有良好的专业性及中立性，能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被继承人真实意愿合理处理遗产。”陈凯说。

“适时建立和推行国家设立规范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龙翼飞说，加快遗产管理人职业化进程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

“近年来，中华遗嘱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解决继承纠纷，将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陈凯说。

白皮书显示，从2023年初开始，中华遗嘱库开展的“百人百场”公益普法项目先后走进北京、上海、广州、沈阳、西安等地的165个社区，开展了273场普法讲座以及93次社区户外咨询活动，累计服务群众达11752人次。该项目成功打通了法律知识、法治理念、法律服务与家庭之间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了普法到家，让广大群众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到公正与效率。

为了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落到实处，帮助更多群众解决遗产继承纠纷难题，2023年10月，中华遗嘱库成立了继承部，通过专业、高效、全面的服务，在数月内即解决了58起遗产继承纠纷案例。中华遗嘱库推出了“继承无忧”八大服务措施，通过建立“联动”“只需跑一趟”“代办”“关口前移”“延伸服务”“异地办理”“涉外委托”“司法服务”等机制，极大提升群众在遗产继承方



面的便利性，最大限度减少了因财产继承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困扰。

“中华遗嘱库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遗嘱服务和继承服务中，通过专业服务，帮助家庭成员明确各自的权益，运用‘继承无忧’八大服务措施做到高效便捷继承，旨在从源头上化解家庭矛盾，防止家庭矛盾升级为社会矛盾，为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稳定贡献重要力量。”陈凯表示，中华遗嘱库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专业、公正、高效的法律服务。

制图/李晓军

南梁“豆选”是我党对“两个结合”的早期探索与实践

□王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深刻总结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内在规律，同时也为发掘和传承革命根据地时期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豆选”是我们党因时制宜对“两个结合”的早期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先行者和社会治理试验区，由此诞生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而其后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和统一战线理论则是人民政协的历史源头。两期“豆选”在民主方法论上完美体现了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递进和起承转合。

选“劳农”“劳工”体现了“第一个结合”

“金豆豆呀银豆豆，比不上咱的土豆豆。一张选票一颗豆，小心投在碗里头。”这是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流行过的一首民谣。与“土豆豆”相对应的“金豆豆呀银豆豆”似有被讥喻为“钱豆豆”的意思。“钱豆豆”选票背后有金主，提示着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存在着“金钱选举”或贿选，“土豆豆”选票背后则是真民主，提示着贫苦人民要翻身做主人。“学古人投豆之法，以黑白二豆分善恶”，投豆之法的历史智慧在根据地被活学活用，这个时期的投豆之法被赋予了阶级性和革命性。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100多位工农兵代表参加了选举，他们用投豆的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叶仲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和陕甘边区赤卫军等领导机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是：雇农5人选1名代表，贫农10人选1名代表，中农20人选1名代表，地主、富农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豆选”充分考虑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际，确保了不识字的老农也能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工农兵的政权。这种选举方式体现了鲜明的革命性和人民性，旨在选出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政权，确保贫雇农在工农民主政权的政治和组织优势。

“豆选”之“豆”和“豆选”之“碗”，作为民主选举的道具，其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性意义。“豆

选”所用的豆粒通常有黄豆、绿豆、黑豆、红豆和白豆等，可统称为“五豆”，这与“五谷”之农业文明的含义是相通的。《黄帝内经》上说：“五谷为养，失豆则不良”，常食五豆补五脏。通过“豆选”，农业文明与现代民主法治意识之间被奇妙地连接起来了。从农业文明中的“选豆”或“选种”，不识字的老农很容易会联想和领悟到“豆选”的意义：选出信得过的自己人或同家人来进行自我管理，这不正是民主的核心内涵吗？所以，每个人手中握着的一颗小小的豆粒就被赋予了生命的力量，只是长出来的不是庄稼，而是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政府。

在农民的眼中，“豆选”用大瓷碗，就是在选当家人，选当家人就是选饭碗。当地农民虽然不认识“饭”字，却深谙“饭”的真正含义：“民以食（饭）为天，无（食）饭则反。”陕甘边的共产党人，他们用当地农民熟悉的“五豆”和“瓷碗”，以“豆选”的方式实现了与当地农民在民主理念上的有效沟通。

选“好人”“乡贤”体现了“第二个结合”

“金豆豆，银豆豆，颗颗不能随便丢；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是抗战时期根据地老百姓称赞“豆选”的民谣。为了建设强大的抗日力量，“豆选制”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力推行。抗战时期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从古代的乡村自治传统中汲取资源，实现了部分文化回归，在乡村创造了一种最大程度合乎民意的基层政权。如果说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投豆法”具有明显的“工农民主专政”之阶级性和革命性特征的话，那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则演进、转化为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基层民主政权建设——“选好人，办好事”。“豆选”由工农专政的手段转变成了团结基层社会的方法，发掘了历史智慧，孕育出了根据地的基层治理和法治社会。

“选好人，办好事”内含着对候选人的能力素质和政治素质的要求，公道、和平、能办事、腿勤是选民最为关注的候选人的品质，选好人，用好人，是保证政权机关真正做到又抗日又民生的前提条件。“选好人，办好事”的“豆选”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明清时期的“功过格”可谓是集大成者。

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向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基层民主政权建设转变过程中，采取了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该条例对于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在选举

法中作出重新限定：“犯下列各条之一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有卖国行为经法庭判决者。二、经法庭判决有罪，剥夺公权期限未满者。三、犯神经病者。四、第一项人的家属。但其家属如系革命者不在此列。”

可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颁布实施，为“三三制”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三三制”政权在人员分配上的规定是：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基层民主选举思想是由苏维埃时期的工农民主选举理论转变而来的，两个阶段的自然传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根据地具体情况相结合，与根据地的乡村自治传统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体现出“两个结合”尤其是其中“第二个结合”方法论的精髓。

“豆选”是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内涵的一把钥匙

两期“豆选”前后相继，从选“劳农”“劳工”到选“好人”“乡贤”，体现出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递进和起承转合，蕴含着重要的民主方法论启示意义。这就意味着，新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在南梁革命根据地这个革命“老区”和中华文明“老区”进行了完整的探索和实践，南梁革命根据地所在的甘肃省华池县，是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时间最长的地方，被称为“永远的红色”，值得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学人深入发掘并传承创新。

今天，我们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角审视“豆选”，就会发现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所在。“豆选”是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本质内涵的一把钥匙。中国式民主为什么能“全过程”？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民主能够“全过程”的最佳土壤。民主主要体现在“全过程”，是因为共产党人有实行“真民主”的坚定信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新成果，在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守民主梦想、探索民主道路，从“豆选法”到“三三制”，从民族区域自治到基层群众自治，从政治协商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发展道路，即人民民主的新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人民高度政治制度自信的根本，因为“豆选”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源头活水，它抓住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各级工会深入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本报记者 潘晓磊

记者近日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近年来，各级工会深入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大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有效预防和化解劳动领域突出矛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全国总工会积极推动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目前，31个省（区、市）全部建立政府与同级工会联席会议制度，23个省（区、市）成立由同级政府分管领导担任主任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工会参与的县级以上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覆盖率超过90%，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每三年开展一届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活动，每五年开展一届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表彰。全国有19个省（区、市）定期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和示范

创建活动，19个省制定了省级和谐劳动关系评价标准。

近年来，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全国工商联先后实施集体合同制度攻坚计划，集体协商“稳就业、促发展、构和谐”行动计划，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集体协商建立健全技术工人薪酬激励的指导意见》，指导企业协商提高技术工人薪酬待遇，涌现出江苏邳州木制品行业协商、浙江温岭羊毛衫行业协商、北京快递行业协商等一批优秀案例。以邳州木制品行业为例，集体

协商前，职工流动率一度高达60%，劳动关系矛盾高发频发。经过连续17年的协商，职工年流动率从61%下降到7%，劳动争议以150件减少到5件，行业年产值达300亿元，占全市GDP30%以上，实现了促进行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的双赢局面。

在各级政府、企业大力支持下，各级工会加大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力度，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工作的通知，8家头部平台企业完成协商机制建设，覆盖910万快递员、外卖员和网约车司

机群体。近日，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推行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工作进行部署，明确要求加强工会与法院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一函两书”在维护劳动者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中的积极作用。今年1月，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的通知》，突出政策集成、协同联动，整合工会、法院、人社等多方力量，促进各类调解衔接联动，规范和畅通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调、裁、诉、执对接渠道，为进一步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提

供了基础支撑和保障。

工会将持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同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层次、更多内容上丰富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实践。一是大力培育推树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计划用5年时间在乡镇、工业园区内培育全国样板站点1000家，省级站点1万家。二是扎实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服务三年行动，力争建会企业、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会及时调解劳动争议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以幸福企业建设为载体，推进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四是推动各级“工会+法院+检察院+人社+司法”协作联动机制建设。五是扎实开展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12351+”专项行动，管好用好12351工会服务职工热线。六是巩固拓展双15工程成果，提高服务质量与内容，增加开放时间，向8小时之外延伸服务。